

蔡錫生紀念文集

趙櫟初題



蔡 镛 生 传 记

(1902—1983)

江福康 白玉白 李铁津

蔡镛生，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催化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光化学研究的先驱者。他善于将新的物理实验技术应用于化学科学研究之中，对我国实验物理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创建和领导的吉林大学化学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科研成果卓著，已跻身于全国综合性大学化学系的先进行列。

蔡镛生 1902 年 9 月 18 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一个贫寒家庭，青年时代就热爱化学，胸怀“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1920 年在泉州培元中学毕业后，免费就读于燕京大学化学系。1924 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努力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与吕兆清（我国制革工业的开拓者和实业家）为振兴民族工业，系统地开展了鞣皮方法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制备皮粉，研究皮粉的物化性质和操作工艺。他们不顾校方的阻挠和要挟，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洋法”制革厂。

1929 年，蔡镛生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光化学与化学反应动力学。他不仅刻苦地学习化学基础理论知识，还特别注意学习所需的物理知识和实验技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氰基紫外光聚合”和“气体通过熔融石英的扩散速度”。通过学习和科研实践，他纯熟地掌握了光学与光谱技术、真空技术以及精湛的吹制玻璃仪器的技术，这使他的两项研究工作很快地取得了满意的结果，1932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蔡镛生 1932 年回国后，仍回燕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和教授。他在物理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不懈地拼搏，曾与本校物理系葛庭燧教授合作，研究了“鱼藤酮的紫外吸收光谱”和“鱼藤酮的光化学分解”，还开展了有关溶液吸附规律的探索研究。在几年时间里，他在中国化学会志上连续发表了 10 余篇研究论文，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同时，他还创办了北京生生仪器厂，利用他研制的玻璃制造化学实验用的各种玻璃仪器，供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单位使用。

1937 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敌伪统治下的北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停办，当时蔡镛生已是颇有名气的化学教授，不管是日本人把持的学校，还是中国人主办的学校，当然都欢迎他任教。蔡镛生欣然接受北平私立中国大学何其巩校长的聘请，与张子高教授一起主持该校化学系的工作，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其反动行径和贪污腐败的反动统治，遭

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47年，北京的大学教授发表了“反饥饿、反迫害、支持学生运动宣言书”，蔡镛生在宣言书上签了名，同情与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

1948年春，蔡镛生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共同开发示踪原子技术在化学研究中的应用。他同卡门（M. D. Kamen）教授合作，用 C^{14} 研究了若干氰化物的反应动力学，发表了“氰化物和腈类（ $N\equiv$ ）化合物的交换”、“氰化钠对 β -羟基丙腈和 β -羟基丙酸的作用”等研究论文。他们所做的开创性研究证明，示踪原子技术是研究化学反应动力学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一技术在今天仍被广泛采用。蔡镛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渊博学识和高超的实验技能受到了美国学者的赞赏。1949年学术访问结束时，美国圣路易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拟聘请他担任教授，并给予优厚的报酬。此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打来电报，请蔡镛生回国任教。在去留的抉择面前，蔡镛生毅然决定“回国去，培养中国自己的大学生”，并于接到电报一周之内离美回国。蔡镛生回忆他抵达祖国口岸的情景是：“当时我下船，而许多人正在上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镛生以满腔热情投身于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行列，先是担任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1952年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化学系，长期担任系主任工作。他曾任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长春市民主促进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82年5月4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83年10月24日病逝于长春。

为吉林大学化学系的创建做出贡献

蔡镛生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党和政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比较优厚的待遇。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部决定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各抽调一名知名教授支援吉林大学，分别担任数、理、化三系的主任。当教育部领导动员蔡镛生到东北去时，他二话没讲，愉快地表示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创业。临行时，他和他的夫人没带高级家俱，没带名人字画，而是带了一批回国时带来的微量天平、油扩散泵、光接收器、玻璃仪器和贵重的化学药品，还有一批图书资料。到了吉林大学，他与唐敖庆、关实之、陶慰孙等教授通力合作，率领来自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7名中青年教师和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开始创建吉林大学化学系。他首先抓教学计划。为了贯彻落实教学计划，他认真组织几门基础课的教学梯队，让学术水平高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经常进行示范性教学。这样，化学系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基础课的主讲教师，保证了教学质量。在教学工作进入正常轨道之后，他又抓科研梯队的建设，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学科中，迅速地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科研方向。建系初期，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全系师生在蔡镛生的领导下，自己搭实验台、做实验仪器。他从国外带来的仪器设备、化学药品，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同时，他还经常让国外的朋友代买稀缺的化学药品。由于蔡镛生和这批知识分子对教育和科研事业的执着追求，30多年来，吉林大学化学系从小到大，从教学到科研事业迅速发展。为国家培养本科生近5000人，研

究生近 400 人。承担和完成了一系列国家重点科研任务，许多科研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以及部委和省市的奖励。吉林大学化学系已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先后从化学系派生出理论化学所、分子生物学系和环境科学系等。

中国催化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光化学研究的先驱者

蔡镛生一贯主张，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既能承担教学任务，又能开展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建系不久，他指导的科研梯队很快地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了满足实验的需要，他还指导实验技术人员并亲自动手，很快研制成功“毛细管高压汞灯”、“氢光谱灯”和“盖革计数管”等产品，这在当时都填补了国家空白。蔡镛生在教学和科研中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7 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以后，吉林大学化学系逐渐地形成全国有名的催化动力学研究中心之一。1963 年，国家把建立催化动力学研究中心的重任交给了蔡镛生。在两年时间内，化学系建立了具有 30 人规模的催化动力学研究室。质谱仪、光谱仪、色谱仪等大型仪器设备迅速安装调试正常，各个化学实验室也都能开始工作，蔡镛生为研究室确定的研究题目“甲烷氧化制甲醛”，这是一个既具有重要学科意义、又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题目。蔡镛生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在甲烷氧化成甲醛的过程中，可能有中间产物甲基过氧化氢产生，甲基过氧化氢进一步分解产生甲醛。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室开展了甲基过氧化氢的合成、甲基过氧化氢的光分解和热分解等全面的研究工作。其中甲基过氧化氢的合成过程极易发生爆炸，蔡镛生不顾危险，经常亲自参加实验，终于清楚地认识了甲基过氧化氢的合成、保存和分解的规律，在学术上达到了国际水平。为了搞清微观反应过程和机理，蔡镛生除继续发展示踪原子技术之外，又部署人力建立质谱分析技术、色谱分析技术和闪光光解技术等现代物理实验方法。其中闪光光解装置在 1964 年已经能用来研究微秒级的化学过程，填补了国内空白。

蔡镛生是中国光化学研究的先驱。70 年代，他承担了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吉林省科委的重点科研项目“光与激光催化的研究”。均相光化学是他熟悉的研究领域。1975 年，他同吉林化工研究院合作，采用光化学方法合成甲基苯基二氯硅烷，利用这种硅烷可以进一步合成硅橡胶。这种硅橡胶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和密封特性，是我国航天工业中一种急需的材料，在他的指导下，采用紫外光引发自由基的反应路线，通过大量实验，筛选出最佳光源，解决了爆鸣问题。这个研究成果在吉林化工研究院顺利地通过了小试和中试鉴定，单体的收率和选择性均超过当时的国际水平，生产出的硅橡胶解决了航天工业的急需。这一成果获得了 1981 年化工部二等奖。

在复相光催化的研究领域，蔡镛生指导研究生进行了光催化分解水和光助催化分解水合成 NH_3 的研究，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结果：分解水的过程除了电子激发的重要作用外，水分子的振动激发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掺杂稀土元素的光催化剂中，那些能使水分子获得振动激发的催化剂，光解水的效率最高。1974 年，他积极指导开展红外振动激光化学的研究。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建立了一套功率输出可达 100W 的 CO_2 激光

器,通过对乙烯氧化的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分子间和分子内的快速能量传递,使振动激发反应的选择性受到限制,即红外激光引发的反应与热反应的产物没有原则区别,除非用极快速的脉冲激光,反应的选择性才有可能提高。由于在光与激光催化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结论,在项目结束时,顺利地通过了专家评议,受到了同行的好评。

蔡镛生在晚年特别注意分子有序体系的制备和功能特性的研究动态。他认为,低温矩阵隔离系统、LB膜和其它有序分子膜,都是值得研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1979年,他指导一名研究生开展了LB膜的研究。他去世后,他的研究集体在他的学术思想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该集体在低维导体膜的设计制备和结构表征方面、在LB膜的层间化学反应研究方面、在分子的取向与排列的研究方面以及特殊磷脂膜体系的特性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获得了中国化学会1988年全国青年化学奖。

30多年来,蔡镛生之所以能指导和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主要是因为他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里没有几个人看书学习,却总能看到蔡镛生在查阅文献资料。当他病重住院时,昏迷中仍然叨念着:光化学、太阳能、……。头脑一清醒,就立即要看文献。在他的学术思想指导下,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出科学论文。请他审阅时,他总是认真推敲,提出修改意见。但让他签名时,他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年龄大了,参加的实验工作不多,发表文章应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你们青年人自己的工作和水平,我希望你们迅速成长起来。”1960年以后,在他的研究集体所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却没有他的名字。蔡镛生成了众人崇敬的无名英雄。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他以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一步一步地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10月24日他逝世后,遵照遗嘱,把他的全部文献、笔记和研究手稿献给了他的研究集体,把他所收藏的1126册书刊,赠送给故乡的泉州华侨大学,完美地表达了他对科学的追求,对家乡和中国这块沃土的热爱。

(转载自《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主 要 论 著

1. Liu-Sheng T'sai, E. O. Wilson. Smoke Tannage. Jour. Amer. Leather Chem. Assoc., 1929, (24): 21—36.
2. Liu-Sheng T'sai, T. R. Hongness. Diffusion of Gases Through Fused Quartz. Jour. Phys. Chems., 1932, (36): 2595—2600.
3. T. R. Hongness, Liu-Sheng T'sai. Photochemical Polymerization of Cyanogen. Jour. Amer. Chem. Soc., 1932, (54): 123—129.
4. 蔡镛生, 于鸿鰲. Studies on Adsorption from Solutions I. Adsorption of Picric

- Acid by Charcoal. Jour. Chinese Chem. Soc., 1934, (2): 99—107.
5. 蔡镛生, 于鸿鹄. Studies on Adsorption from Solutions II. Adsorption of Styphnic Acid by Activated Charcoal. Jour. Chinese Chem. Soc., 1934, (2): 193—197
 6. 蔡镛生, 罗宗实. Studies on Adsorption from Solutions III. Adsorption of Picric Acid by Silica Gel. Jour. Chinese Chem. Soc., 1935, (3): 16—21.
 7. 蔡镛生, 赵锡霖. Wooden Co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 Furnaces. Jour. Chinese Chem. Soc., 1935, (3): 196—197.
 8. 蔡镛生, 谈冠英. The Action of Formaldehyde on Hide Power. *ibid.*, 1935, (3): 296—300.
 9. 蔡镛生, 严文兴. The System: Aluminium Sulphate-Potassium Sulphate—Water. *ibid.*, 1936, (4): 178—182.
 10. 葛庭燧, 谢玉铭, 蔡镛生等. The Ultraviolet Absorption Spectrum of Rotenone. Jour. Chinese Chem. Soc., 1938 (6): 40—43.
 11. Liu-Sheng T'sai, T'ing-Sui Ke. The Photochemical Decomposition of Rotenone. Jour. Amer. Chem. Soc., 1941, (63): 1717—1718.
 12. Liu-Sheng T'sai, Shih-Hsien Chiang. The Effect of Electrolytes on the Cathaphoretic Mobility of Colloidal Carbon. Jour. Phys. Chem., 1941, (45): 1093—1096.
 13. Liu-Sheng T'sai, Kung-Yao Chuang. Coconut-Shell Charcoal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f Zinc Chloride and of Hydrochloric Acid on Activity. Ind. Eng. Chem., 1942, (34): 812—813.
 14. Liu-Sheng T'sai, M. DKamen. Exchange of CN with Nitriles. Jour. Chem. Phys., 1949, (17): 585—586.
 15. Liu-Sheng T'sai. Action of Sodium Cyanide on β -Hydroxypropionitrile and β -Hydroxypropionic Acid. Jour. Amer. Chem. Soc., 1951, (73): 1886.
 16. 沈壕, 田淑瑞, 蔡镛生. 碳-14-标记氰化钾或钠的制备. 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1957, (4): 263—267.
 17. 蔡镛生, 王琪, 魏詮等. α -桐油酸的自动氧化 (I). 吉林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1959, (9): 111—116.
 18. 蔡镛生, 千载虎, 金范洙等. 腈类和氰化物之间的交换. 吉林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1959, (8): 105—106.
 19. 蔡镛生, 金日光, 夏重信. 利用阶梯管法测定重水含量. 吉林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1960, (1): 129—133.
 20. 夏重信, 蔡镛生等. 光化法合成甲基苯基二氯硅烷单体烷单体的研究. 中国化学学会 1978 年年会论文摘要集, 1978, 127—133.

简 历

- 1902年9月18日 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
- 1924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
- 1932年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获博士学位。
- 1932~1947年 任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大学教授。
- 1948年1月~1949年4月 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做学术访问。
- 1949年5月 任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
- 1952年9月 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教授，系主任。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长春市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长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化学通报》编委。
- 1952~1983年
- 1983年10月24日 逝世于长春。

同甘共苦四十余载

涂 碧 波

我和镗生生活在一起有46年，我们共同度过了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程，许多不可磨灭的往事时常在脑海中浮现。他虽已离开我们十年了，睹物思人，情牵梦绕。

我们是在1937年4月结婚的，婚后三个月即发生了芦沟桥“七七事变”。当天下午，我们和几位友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家相聚。忽然传来消息，日本军已攻占了芦沟桥，我们三家当即商定，迅速离开北京南下，不做亡国奴。当晚我们就带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燕京大学。路过芦沟桥时，只见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在两旁检查行人，还凶相毕露地殴打中国人。我们心情十分紧张，随着逃难的人群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顶上及车箱内拥挤不堪。为了逃难，能找到一席之地也就满足了。火车不知走了多少天，才到了南京。我们住在我二哥涂长望家。不久日军进逼南京，我们又逃到武汉，还带着复之、安力，当时我已怀孕。到了武昌，住在三哥涂莹光家。那时逃难的人很多，住在三哥家中的已有不少人，我又得了重病。日本空军每天飞来轰炸武汉，我们的生活来源无着，镗生忽然想起在北京时萨本栋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福州人，曾动员镗生一起回福建工作。他就决定到厦门大学任职，经过艰难的旅程，他终于抵达厦门。萨校长任命他为理学院院长。

当时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镗生在厦大任职不久，日军又紧逼福建，厦门告急，厦大决定迁至内陆长汀。在此期间，镗生和化学系师生们日以继夜地将仪器装箱，准备迁移，因劳累过度，吐了几口鲜血，被送至鼓浪屿救世医院诊治。被美籍医生误诊为肺结核，需卧床休养一年。他当时心情沉重，不能随厦大师生去长汀。在医院卧床期间，感到绝望，看到病室窗外一水之隔的厦门，每天浓烟滚滚，日本军在那里任意烧杀抢劫。另一边窗外是鼓浪屿的坟地，每天不时地听到悲伤的哭泣声，远离的家人音信全无，精神达到了崩溃的边缘。鼓浪屿是租界地，日军不敢来骚扰，老百姓可以自由行动。幸好有好友王应睐先生的兄长，还有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以及他中学的同学常去医院看望并接济他，使他鼓起战胜病魔的勇气。

自镗生离开武汉后，武汉亦告急。我们全家人随着我的父母逃到鄂北钟祥县普爱医院大哥涂登榜处。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也不知镗生的音信。后经友人们转来的消息，得知他在鼓浪屿有病住院。征得家人们的同意我便只身启程前往鼓浪屿探望。当时交通不便，由钟祥县到宜昌，没有汽车，山路崎岖，只能骑马，夜间人畜共住一茅屋，沿路还怕国民党败兵骚扰。经过几天的行程，到达了宜昌。从宜昌坐轮船到重庆，满船都是逃难的人。抵达重庆后，又挤住在二哥涂长望家中。在重庆稍事休息，日空军又常空袭重庆，为了避免交通阻断，即行再度启程经贵州抵达昆明，借住谢冰心先生家。最后乘火车至越南河内，绕道海防经香港抵达鼓浪屿和阔别将近两年的镗生见面了，互诉离别的苦衷。战争期间，旅途艰险，从重庆到昆明，汽车在山区行驶，忽上忽下，有时上下要

绕五十多个弯，公路狭窄，稍不注意即有翻车掉到深谷的危险，因此令人望而生畏，加以国民党败兵沿途横行，至今回想，尚有余悸。

我在鼓浪屿住了一星期即送镠生去香港就医，那位医生是我大哥在香港读书时的好朋友。经过复查否定了“肺结核”的诊断，确诊为支气管炎。鼓浪屿医院的误诊，使镠生在病床上白白浪费了一年的时间。确诊后，他便立即和燕京大学联系，决定回燕大工作。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大是世外桃源，日本人未曾进入校园，教学工作照常进行。我们由香港乘太古公司英轮抵达天津塘沽。燕京大学派了美籍教授上船接我们，下了船要坐火车至天津。车中除那位美籍教授波特和我们两人外，全都是日本军人，恐惧和紧张的心情不言而喻。我们在车上感到度时如年，火车终于到了天津，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就是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燕大。镠生经过一阶段的休息很快就又投入了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入了燕大，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当场宣布解散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美籍教师都送至东交民巷软禁。我们被强迫撤出燕大。不得已我们迁居海淀，当时我的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家中共八口人，镠生失业了，日子越来越艰难，镠生不忍抛开我们去解放区，他也不愿去伪大学任教。燕大关门不久，陆志韦，赵志辰等十几位教授被捕，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因此我们夜间不敢脱衣睡觉，以防日本人随时进家抓人。日本人压迫中国人越来越凶，不准中国人吃大米，仅配给少量的盐，每月配给中国人五十二种混合面，里面掺杂有沙子、谷糠及各种杂物，小孩们哭着不肯吃。我们豢养的本为小孩们挤奶用的两只羊，因没有饲料也饿死了。不能去解放区，只好受日军宰割，日子实在难熬，于是镠生和张子高先生商量后，便都到私立中国大学化学系任教，每月工资只有一袋白面，不能维持生活。我只得去北京市护士学会登记，当特别护士，护理危重病人，将收入所得贴补家用。在日伪时期，出入西直门都要受到伪警察及汉奸们的搜查，稍有反抗即遭毒打。我们不甘受此侮辱，就住在城内，每星期两人骑车出城给家人送些食物。我们在北京城内及市郊随时可以见到饿死在路旁的百姓，被一块破席盖着……。

我们在北京天天等日日盼，终于盼到日本投降了。1945年我们又回到了燕京，镠生又投入了紧张的复校工作。国民党回来了，他们贪污腐化，弄得民不聊生，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不知中国向何处去？1947年经友人介绍，我和镠生先后去美国密苏里，圣路易士城，我在医院工作。1948年镠生到华盛顿大学和 M. D. Kamen 做研究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燕大校长陆志韦先生打电报，请他回校任教。他立即辞去圣路易大学研究院的工作，在一周之内准备就绪，启程归国。轮船沿途经过夏威夷菲律宾时，在那里的朋友都劝他留下，他婉言谢绝，决心报效祖国。

1949年4月回到已经解放了的北京。他异常高兴，因为可以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了。我是1950年初回国的，不久燕京开展了肃清美帝侵略的影响及思想改造运动，我们积极投身于运动中。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镠生被分配到当时的长春东北行政学院，后改称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为了响应号召，他没有讲条件，毅然在一星期之内离开了他读书和工作了几十年的母校燕京大学，离开了第二故乡北京，去陌生的东北长春。我们拍卖、赠送、甚至扔掉了多年积累的家俱、书籍及其它珍爱的物品，便

匆忙地带领全家人登上北行的列车……。

初到长春时，没有住房，暂住在长春宾馆，到学校地区一看，只有两栋楼，学校住宅区竟是被国民党轰炸后的一片废墟，然而我们毫不后悔。在宾馆住了两个月，就搬到柳条路9号两层楼的住房。我们住在楼上四间，余瑞璜先生一家住在楼下。室内没有家俱，我就将带来的衣箱放在屋内四周当座椅。我们只随身带了一个双人铁床，学校给了我们唯一的一张书桌，兼作看书、吃饭两用。在厨房里两家共用一个煤炉做饭。我从未用过煤炉，又不擅于烹饪，有时拖到中午也吃不上早饭。有一位烧锅炉的师傅看见我们很狼狈，便替我们找了一位保姆，这才解决了我家的吃饭问题。

冬天室内只有一层纱窗，一层玻璃窗，因而很冷，我们晚上就坐在床上看书，虽然处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但也毫无怨言。我们想，要是和那些长征干部比，我们的条件还是优越的。后来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学科研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我们心情更安定和舒畅了。

镗生一到校就开始了化学系建系工作，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们共同努力创建了化学系。总之，镗生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一生热爱祖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了微薄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使他被隔离审查。在此期间亲友也受到株连，家中被抄两次，我也常被造反派传去审讯。

祸不单行，他被隔离不久，我被迫下乡参加秋收。我本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病，又因精神压力大，心绪不宁，下去一星期后，胃就大出血。我被送至医大二院急救，随后每天都要去校医院注射止血针，血止住后就上班，不敢休息，因为家中老幼全靠我微薄的工资生活。

半年后，他才解除隔离，这时我才知道他被关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房子里，冬天室内全是冰霜，冷冻难忍。幸亏我买了一件新棉大衣送去，才算熬了过来。每夜红卫兵还要逼他交待罪行，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解除隔离后回到家中，他从未发过怨言，至今子女还不知道他所受的侮辱与折磨。后来当专案组的同志来家征求意见时，我向他们诉说了镗生所蒙不白之冤。事后他还批评我不应该向他们提出任何异议。他就是这样不愿为社会主义抹黑而忍辱负重。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认识到所谓“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给全国制造大混乱，给国家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

我们相处的几十年中，他勤奋工作和学习，为人谦虚、谨慎，不谋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生活俭朴，对家人要求很严，对亲友、学生、工人非常热情友善。直到生命的最后几日，脑子清醒时还看文献和同志们讨论问题。不幸在1983年10月24日凌晨，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镗生啊，你走得太早了！你如能活到现在看到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你该是多么高兴啊！你生前关心的家乡泉州，现在已是开放城市，各项事业都在迅速地向前发展。你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吧！

你生前很留恋北京和母校燕大，1989年10月我们已将你的骨灰盒送到北京西郊万安公墓，西望西山，东望燕园。你安睡在那一片树木环抱，鲜花丛生，幽静的环境中，你安息吧！

写于1993年4月9日结婚纪念日

大哥蔡镛生给我们的教诲

刘 恩 惠

1902年大哥出生于福建泉州百源村。由于父亲刘文福幼时家贫未能系统就学引为憾事，决心要送子上学以培养成材。大哥幼时，父亲就送他去塾师郭永绥处接受启蒙教育。当时他的领悟与理解能力特快，深得老师的喜爱，稍后续入佩实小学就读。小学毕业时大哥被列为最优等学生。入培元中学后，同学们便以“最优等”为大哥绰号。培元中学为基督教会学校，每周有两次英文礼拜（弥撒）读英文圣经，并有英语布道，对英语要求较高，而佩实小学系一般私立小学，英语根基较弱，初入学颇有难于招架之势。大哥便迎着困难上，以十倍的努力面对英语的挑战，至毕业时他的各科成绩均已名列前茅矣。

中学毕业后，又因家贫无力升学，大哥前往晋江前埔，担任小学教师工作。当时小学教师薪俸微薄，要储蓄筹措异日升学之资实非易事。便在教书之余饲养小猪生息，生活极为俭朴，以薪俸和猪款做为升学之用。1937年大哥赴厦门大学担任理学院院长。

父亲早年有挚友蔡团成不幸死于鼠疫，留下寡母一个，父亲便代蔡伯侍奉晨昏。后来蔡老奶奶以遗产相赠并嘱咐日后能给一子成家，作为蔡家香火传世之续。大哥原名蔡恩来，小学毕业后为不忘报恩便取号镛生（寓刘家所生之意），四哥蔡鸿恩也效法大哥，取字则镛，六弟也取名蔡恩镛，父亲笃信基督教，故二哥取名刘施恩，三哥取名刘双恩，我也遵嘱名为恩惠。

大哥学生时代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连吃饭时都不放过学习，每日都是边用饭边看书，每逢春节他便上街写春联出售，一方面可补贴家用，又可利用机会练习毛笔字，以后三哥四哥也都以大哥为榜样，年年写字卖春联。母亲在世时，经常以大哥为榜样教育我们要向大哥学习。由于他在学习中勇于开拓，深受燕京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威尔逊所赏识，故他在燕大读书是靠向学校贷款来维持学业的。1929年燕京大学又选派大哥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在大哥尚未大学毕业时，又辅修皮革科，并于1922年与同学吕兆清、魏稚平、刘仁政等人创办北京硝皮厂于灯市口，一方面可以增加点收入，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制革技术引入中国市场，以改进我国古老制革技术。1935年又鼓励魏稚平去汉口创办汉中皮革厂，因抗战爆发1938年汉中皮革厂内迁重庆，到1943年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吞并而告结束。

为实现工业救国，大哥于1933年又发动同学和好友创办玻璃厂，但因用人不当，经理刘××拐款潜逃东北，招致工厂破产。尽管办玻璃厂失败，但他认为中国玻璃工业很落后，一定要迎头赶上，他长时间都把工资贴上并在燕东园的僻静的荒地上和破屋里进行试验。为了不使玻璃仪器工业垄断在外国人手裡，他培养吹玻璃仪器的技术工人，刻度筒的技术工人，并办起生生玻璃仪器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业凋敝。他很想用他的学识在化学工业上闯出一条新路，大哥在中国大学的学生张实礼自愿吃苦，便拿微薄的工资来支持大哥，从事日用化学工业品

的研制工作。可是在解放前，这仅是个梦想，要开展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解放了，对他来说，才能扬眉吐气，他可以专心致志去做学问，得以从事深入的学术研究。他相信共产党会全面支持和提供有关振兴中华夙志的条件。因此1949年初北平刚解放，他就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回到首都北京。

大哥对弟妹们的培养和关心也是尽心尽力的。四哥（鸿恩）在上高中时，他就独力供给四哥去北平上学，大嫂也竭力支持。当时大哥只是个小助教，收入微薄，又要偿还学生时代的贷款，手头并不宽裕。四哥高中毕业后，去上海学医学也是由大哥供给。1931年大哥又把我接到北平上中学，那时育英中学学费比一般中学高得多，他从不心疼。上高中时我要求转到潞河中学，他也不阻挠，他说：“你已是高中生了，能分辨是非得失了，我尊重你的意愿”。他对兄弟的爱也是很深情的。我姊刘碧漪不幸于1952年因药物过敏死于张家口，妹夫张孟嘉（述）以一个中学教师要独力抚养四个年幼的儿女是很困难的，大哥每月都寄钱帮助他抚养子女直到“文革”，使他能安心工作，为张家口市的建设贡献力量，张家口地委对张述的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1]，这与大哥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样地大嫂对大哥的所作所为也都给予支持，从没有说个“不”字，妹夫一家至今感念不忘。三哥在外贸部租船公司任总经理，“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身患重病，不幸于1978年医治无效逝世。大哥很是哀痛，每每说及三哥他便悲痛欲绝。大哥的身体也因此一蹶不振，越来越衰弱了。本来以吉林大学的医疗条件及吉林省委的备至的关怀，是完全可以让他多活几年，多做些工作，不至过早辞世。可是大哥为祖国为人民为弟妹操劳过度，终于与我们永别。这里顺带提一下，他以捌秩高龄还很少看电视，除了大节日，难得整晚坐在电视机旁，一般每次新闻节目看过，他便到书房仍孜孜不倦地查文献看杂志或研究和思考问题。他还经常教导我们：为人应认真做学问，认真做正派的人，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四哥遵从大哥的教导，发表了三、四十篇西医学和中医学的论文^[2]，认真发掘中草药的优点，为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四哥给病人看病治疗，从不要人送礼、送红包，他说，“大哥教导我们，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要照父母亲的榜样去做，我是尽量去学去做的”。因父母亲以行医济世，从不计较生活维艰困难，所以一辈子都是个穷医生。

大哥对同学对朋友也都是真诚的。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哥应萨本栋校长之邀到厦门大学任理学院院长。他劝老同学陈允敦老师到厦大任教。萨校长因陈老师仅仅毕业于燕京，没有出国深造，十多年来又只任矿务学校校长、晦鸣中学校长等职务，没有在大学工作的资历，只愿聘他为助教。大哥劝他从长远看，不要计较一时得失，陈老师接受劝说，留在厦门大学，终于成为矿物学、地质学和计算尺的知名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形势已危在旦夕，当时谢玉铭老师犹豫不决，不愿南下，大哥与他分析形势，认为不能留在北平做顺民，做难民，谢老师才决心南下，去贵阳后又到长汀，坚持到抗战胜利。

大哥与胡传葵、张子高二位老教授更是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在风雨如晦的沦陷区的北平，他们互相安慰、互相鼓舞，终于渡过艰难的岁月直到解放。

大哥始终热爱家乡，他希望泉州在科学技术上也成为名城，“文革”后期他多次来泉州，有两次住在华侨大学，指导激光化学和超微粒子的研究。他还担任母校培元中学董

事会副董事长，他提出建设：要发扬培元中学的优良传统，继续大踏步前进，让培元越办越好！

大哥一生生活极为俭朴，衣着但求温暖，不求豪华。孩子们的穿着也都很朴素，家里的剩饭菜，常常是他“包”了的，也正是有这种锻炼，在北平沦陷期间，生活极端清苦之时，吃混合面、黄豆粒，他都挺过来了。

大哥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对我们的教诲，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指导我们前进，长兄的亲切形象永远在我们眼前闪烁永不泯灭的光辉！

[1] 见1990年8月15日张家口日报《张孟嘉先生寄书表深情》作者吴德源。

[2] 见《泉州文史资料》第五辑《中西结合的典范——纪念蔡鸿恩医师》作者柯乔木。

怀念我们的爸爸

蔡安丽 蔡复之 朱锦芳 蔡复江 李志云

爸爸离开我们整十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不只因为他是我们敬爱的爸爸，更主要的是爸爸是我们做人的楷模，他的言行激励我们奋发上进，去做一个正直有为的人。

我们姐弟四个远离父母在外地工作。60年代后，我们陆续成家，父母亲不辞辛劳，默默地为我们承担起哺育后代的责任。六个孙子女中有五个是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幸福童年的。爸爸常对我们说：“孩子放在我们这里，你们就放心吧！我只希望你们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父母亲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我们没辜负爸爸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地工作。

爸爸孜孜不倦，勤奋学习。

爸爸早就是学部委员，知识渊博，但他总是手不释卷，每天读书到深夜。在动乱的年代，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停地读书。在那“读书无用”流毒甚广的年代，他语重心长地对孙女蔡涓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固然不对，但不学数理化更加可怕，那将会亡国的呀！”。特别是在年事甚高时，仍坚持不懈地读书。每次来北京，在短短的几天里也忘不了学习，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去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旅行途中，经常带着书看或与同行的老师讨论学术问题。爸爸为了振兴中国而奋发读书，往往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1977年初秋的一天，爸爸看书到凌晨，刚入睡不久就感觉左边身子发麻不能翻身。第二天到医大一院检查，原来得了脑血栓，立即住院治疗。医生说这是用脑过度所致。从此爸爸戒掉多年吸烟的习惯，但从放松读书。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不顾家人的劝阻，仍然读书到深夜。爸爸常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一辈子也学不完”。

爸爸治学严谨，实事求是

孙女蔡梅、蔡松有时间问一些中学的化学问题，他不清楚就说不清楚，决不以化学权威

自居，爸爸不论接到系里或学校或政协、民进的会议通知，他在家里都要认真考虑会议内容，并常写好发言提纲，尽管他常常不发言，但他说：“既然去参加会议，就要作好准备”。

1981年初夏长春二中有一个班的班团干部要采访爸爸，当爸爸得知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欣然接受来访。他花了几天的时间作准备。学生来了，爸爸拿出写好的发言稿，怀着气愤的心情向学生讲述青年时代在美国留学的遭遇：“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乘公共汽车，车还没开，我们拼命跑想乘上这辆车。这时只见乘务员将头伸出窗外大声喊叫：“你们这些猪快跑”，我们羞怒得满脸通红，这个外国人是在侮辱我们的民族呀！但有什么办法？那时我国是殖民地，贫穷落后、毫无国际地位，中国人就得挨欺辱。现在不同了，中国独立了，并且一天天强大，外国人再也不敢欺辱我们了。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所有的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不谋私利，严以律己，以身作则

爸爸从不搞特殊化，对子孙们也严格要求，孙女蔡梅曾要爷爷帮助联系出国留学，爷爷没有答应，并告诫说：“要靠自己奋斗，不靠老子关系，走后门，不要以为爷爷是化学家，你们的化学就学好了，要靠自己勤奋学习”。

70年代马祁回家探亲，当时天正冷还没来暖气，家里要安个煤炉取暖，炉底下要垫砖以免烧坏地板，马祁和保姆到家对面工地拿了几块砖回来，爸爸知道后批评她们不应拿公家的东西，并要付钱。当时家对面修建学生宿舍，雨天门前小甬道泥泞不堪，行走困难。志云和保姆到门前工地拿些砖铺在甬道上。爸爸见后就问砖是从哪里弄来的，志云如实回答。爸爸听后脸一沉，非常严肃地说：“真糟糕，怎么能拿公家的东西呢？得把砖钱交给工地负责人。”爸爸见我们早出晚归工作忙又不知应把钱交给谁。过了几天，爸爸以轻松的口气对我们说：“我今天乘汽车上街，在车上我买了一本车票，下车后我全撕掉了，这样就把砖钱还给公家了”。说完爸爸如释重担，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1983年爸爸病重住院，到了10月中下旬病房还没暖气。这对一个有病的老人来说是极不利的，我们从家里拿来电褥，爸爸不肯用，说这样要浪费电，见此状医护人员也极力劝说：“一个小电褥用不了多少电，您放心用吧。”爸爸还是不肯用，最后医护人员只好说：“蔡老您用电褥，我们收费好了。”爸爸这才同意用电褥。

爸爸一向宽以待人，和蔼可亲

爸爸当时算是高薪阶层，但开销极大，每月要寄钱给奶奶和姑父。几个孙子女都是人工哺育，花费很大，但爸爸妈妈毫无怨言。爸爸对生活有困难的师生总是慷慨解囊。多年来资助生活有困难的师生达数千元，从不吝惜，当时院内几家共用电水表，每次收费时爸爸都要拿大头，其余部分由几家平均交费。每次维修队的师傅到家里来修理下水道、水管或门窗时，爸爸都要热情接待，亲自点烟、送茶。爸爸说：“没有这些工人师傅，我们就无法生活。”烧锅炉的师傅见爸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喜欢到家里来和爸爸交谈。年三十晚，请烧锅炉的师傅吃饺子，爸爸说：“家家都在吃团年饭，而他们却在为我们烧锅炉，真是难能可贵。”爸爸非常尊重他们。

爸爸一生艰苦朴素，要求子孙们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作风

爸爸从不讲究吃穿。家中保姆常说：“蔡老师真好对付，从不挑吃，做什么都说好吃。”记得1982年初夏的一天，爸爸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找一套像样的衣服送到办公室去，他要会见外宾（妈妈在北京治病）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套混纺中山服还像样子，爸爸就穿着这套衣服会见外宾。去世时也是穿着这套衣服走的。妈妈要给爸爸做衣服，他不让做，并说做了也不穿。平时一支小小的元珠笔坏了都要修好了再用，经常是把元珠笔芯用纸卷起来当笔用，牙刷柄断了，用蜡烛烧软接上再用。60年代外孙李焰买了一顶高级皮帽，受到劝告。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们也养成节俭的习惯，已是大学生的复之、复江、复礼裤子短了，在裤脚上接上一段接着穿。

爸爸离开我们了，留给我们的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那慈祥的音容时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那谆谆的教诲时常在我们的耳边萦绕，我们永远怀念爸爸，安息吧，爸爸！

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蔡复礼 马 祁

爸爸离开我们已将近十年了，他的慈祥面容，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他以身做则的优良品德，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永远鼓舞着我前进。有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爸爸为我们的成长创造了好条件

中学时，当时长春的中学都是学俄语。爸爸认为学习英语将来是很有用的。所以就给我们请了老师在课时教我们英语。值得一提的是所请的老师是个旧洋行职员，他会英语，当时没工作，在街上卖水果，爸爸发现后就请来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并给他学费作为接济。早期的英语学习为我们以后学习掌握英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上大学三年级后，爸爸主张我们学化学专业的要学会查美国化学文摘(CA)，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性的检索工具。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们学物化专业的同学都非常认真地查CA，开始英语基础差，爸爸就教我们翻字典。在爸爸的指导下，同学们不但学会了检索，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英语水平。当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和良好检索文献的习惯对以后的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爸爸教育我们先立业后成家

爸爸常对我们说：“不论学习阶段或参加工作后都应集中精力把学习、工作搞好，然后再考虑个人问题。”爸爸要求我至少写出十篇论文后再考虑结婚，告诫我先立业后成家。

爸爸对我要求很严

爸爸是化学系系主任，我是学生，他对我要求很严。有一次做实验一个操作步骤错

误，引起爆炸，烧瓶炸成碎片，玻璃碎碴扎进手上皮肤。当时都认为反应中一种药品是很毒的，进入伤口会有生命危险。大家立即把我送到医院，经急救才脱险。我缠着绷带出院了。爸爸看我回家来（他当时有病在家休息）只说：“爆炸影响了试验，做试验哪能这样马虎呢？待伤口好了后，你给系里写检查”。

爸爸支持我出去闯

1968年“文革”告一段落，我们研究生班的同学面临分配。当时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但我一走，家里只剩下了父母俩人，他们年迈体弱，还要遭受“文革”的迫害。爸爸妈妈是多么希望我能留在他们的身边。但他们更理解我的心情，我的志愿，他们还是支持我去大庆。爸爸妈妈认为大庆能锻炼人，并坚信在大庆会有很大发展。临走时爸爸对我说，他的历史没有任何问题，让我放心走（当时正在查他的历史问题）。

爸爸热爱大庆，关心大庆的建设

我到大庆工作后，爸爸妈妈很想到大庆去看看。70年初父母亲来到大庆，住在我们干打垒的家。当时大庆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毫不在意。通过参观大庆油田，大庆炼油厂和我们研究所，他们感慨万分，非常高兴，认为大庆不愧为全国人民的榜样。认为我闯对了，在大庆工作很不错，是有前途的，鼓励我好好工作。以后每当爸爸在化学刊物上看到对我们研究工作有利的信息和资料时就立即写信告诉我们，给我们参考，以便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这使我和马祁能全力以赴地搞好本职工作。

爸爸在病中，仍关心福建及家乡的建设。1982年初在北京阜外医院的病室中向福建省的领导提出建设福建省的建议。他认为福建省可依据“三山一水”的自然特点，发展畜牧业，在此基础上发展皮革工业，制成各种运动球类出口，赚取外汇，为福建省的建设积累资金。他还约定上海皮革厂的老友吕兆清先生同去闽考察。不幸病魔缠身，未能如愿以偿，爸爸呵！你走得太早了，未来得看见家乡的巨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您的家乡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厦门，泉州，福州都是开放城市，改变了从前落后的面貌，您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爸爸，我要遵照您的教导，勤勤恳恳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倾注我的全部力量，决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爸爸，我们全家人时时怀念您，爸爸安息吧！

深切悼念内兄蔡镗生教授

张 述

镗生兄逝世有些年了。可是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高风亮节，至今仍为海内外人士所怀念。我近日由少子西林蒙特利尔（Montréal, P. Q. Canada）之家返回厦门特区，接到吉林大学化学系光化学研究室通知决定编著镗生兄纪念文集，至为欣慰！镗生兄作为

我们一家之长，扶植诸弟妹、孝侍其父母，鞠躬尽瘁，毫无偏私，乡党亲朋，无不敬爱其高尚人格与自身克勤克俭的作风，加以在神州高等学府化学界中之崇高地位，道德文章，互相辉映，形成了一个自谦学人最完备典范，当非溢美护私之言也。

我每回忆亡妻于1952年被一个医学浅陋之人，打青霉素以致心脏休克，突然身亡一事相联系，至今哀痛难忘！当年（几十年前）我在河北张家口一中教室内，被一个惊奔同事叫出教室，告以凶讯之时，如天崩地裂，不知所措！及赶至附属医院急诊室时刻，只见亡妻刘碧漪（榴生兄之胞妹）已僵卧瞑目在病床上，千呼万唤也不能使她有丝毫反应，虽我疯狂般要求医生拯救，再打强心剂，终于无济于事，即木然发呆不知所措，幸好二三好友同事代为安顿善后，一边急电告知北京外贸部租船公司之妻兄刘双恩夫妇，火速前来照料，结果只有刘之妻一人前来，向一中及医院了解前后逝世详情以后，经协商暂不令吾岳母得知此哀讯，一边令诸幼小子女变服服丧，并由一中在张家口平门外荒山小丘上安葬。这一幕幕人生悲剧是漫长而悲惨的！我一人单力在外，加以当时处境的艰难，倘非榴生兄夫妇的协助与劝慰，我也不知我和一伙嗷嗷待哺群雏如何渡日？榴生兄以手足至爱亲情，每月汇出一些补助，作为三子一女养育之资，十年中未尝间断，倘无此助，诸子必成饿殍！那有今日茁壮成长之日乎？！为此，我每教诫自己子女终生莫忘其大舅在危难中伸出援助之手的高谊隆情。自1952年起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榴生兄救急费用从未停止，后因当时极左流毒，使他自身也被冲击，自身也不能自保，才中止这源头活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了！

而今我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榴生兄之骨肉外甥，各已成家立业，分别在加拿大及香港。从事新闻记者，房地产业及工程工作，并已初步能在百业竞争中立足了，榴生兄在天之灵有知大可安慰吧！

亡妻之遗骨仍在张家口郊外，年年清明都有子孙前往祭扫，我要把他火化收拾迁回崇武，但内外儿孙迷信风水，极力反对，此愿不得不服从大多数人意见了。今年满地可少子之妻马利明返张垣，即与其姐马利军（四子之妻）在清明节日，代表海内外各家前往拜奠以尽孝思，记得1953年清明，我有一诗追悼亡妻：“月落星繁痛此身，平门回首满风尘，可怜蔓草荒丘骨，犹是娇儿梦里人！”

榴生兄之妹逝世至今近半世纪了，每承吉林大学化学系榴生嫂不遗在远，殷殷垂注，可惜南北距离遥远，无从经常请安，然而吉大光化学专业诸君子，今年五月将收集纪念榴生兄之文集付梓，届时国内外诸名流教授，必有文章诗词悼念，虎骨龙章，美不胜收，榴生兄安息吧！

注：“亡妻乃全中国第一位打青霉素心脏休克病例，从1952年冬开始，全国医学界方知打针前须先试验，以防止休克。”

亲 切 的 怀 念

——回忆舅舅二三事

周 牧 易

忆述1953年我到长春上大学，在那五年中，我能经常见到他，因为舅妈每到周末叫我回